

50742 5837
0131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特殊岁月

——为纪念建党70周年而作

石仲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1年7月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法宝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这个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外国送来的？不是。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同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有一个逐渐形成的发展的过程，即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1939年到1941年，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连续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不仅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且他的许多分析和论述，在理论上异常地丰富、充实和逐渐地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这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自此之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渐趋成熟，并基本定型。本文试对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作一初步分析。

一、认识的起点和统一战线 思想发展的历史土壤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但是，从党的发展史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先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实践。自党的二大提出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任务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命运就与能否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

紧紧地拴在一起了。在 1939 年至 1941 年前，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经历了 1924 年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1927 年至 1937 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大一统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战开始以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三个发展阶段。通过对这几个阶段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发展与挫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已经有了这样一些基本观点：

（一）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

（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

（四）民族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排挤，在一定程度上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应该同它建立统一战线。

（五）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不可能始终留在统一战线之内；这种动摇性使其不可能完全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并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感到恐惧，甚至不惜采取欺骗、诱惑与打击的破坏政策，作为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坚决的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排斥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又要反对放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去迎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私利的右倾投降主义。

（七）在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

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把资产阶级视为统一战线的伙伴而不是敌人；所谓斗争，就是搞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开展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为武装斗争。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既是同构的，又是同步的。党的许多领导人虽然也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主要通过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体现出来。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后，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越来越具有毛泽东的思想特色。上述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点，也是到1939年时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因而也可以视为他随后即将发展统一战线思想的认识起点。

1939年至1941年是中国抗战史上统一战线各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外形势变化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它为毛泽东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土壤。

从统一战线的外部形势看，首先是日本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统一战线发生着直接影响。自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瓦解抗日统一战线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汪精卫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

其次，英、法、美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也影响着中国统一战线的走向。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他们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在1940年夏天日本已暴露了对南太平洋英美殖

民地即将入侵的野心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

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那时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估，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候”，“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①

从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全民族的最广泛的广泛性。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这个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共两党曾经既是结盟同志，又是冤家对头。自1924年大革命以来，两党经历了合作——分裂——再合作的曲折发展过程。芦沟桥一声枪响，抗日利益高于一切。两党才释开过去的仇怨，重新携起手来。但是，两党实行抗战的路线是不一样的。蒋介石国民党由于继续坚持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一党专政制度，顽固推行单纯依靠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会战，但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进攻。在抗战开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内，国民党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国民

① 1940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电。

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有效的打击和牵制了日军的进攻，而且自身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20万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这也不会不反馈到统一战线中，对其内部关系发生影响。

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蒋介石国民党的仇共、惧共心理日益加剧。再加上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国际“绥靖主义”潮流的渗透，国民党当局政策的重点迅即发生了逆转，并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方针。随后，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武装摩擦事件，袭击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更有甚者，先是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在华北以进攻山西新军达到顶点，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从1940年10月的何、白“皓电”开始，到1941年1月制造血腥大屠杀的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际，又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这是整个抗日战争阶段阶级斗争最激烈并达到白热化的时期。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几乎濒于破裂。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发展史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从第一次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是完全分裂，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相对地说，矛盾比较单纯些。对处理这样的关系，我们党从没有经验到逐渐地积累了不少经验，比较能够应付了。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

国民党正积极抗日，能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关系总的说来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是，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以后，并且发动了反共的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统一战线，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新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日；另一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致。

如果说历史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复杂性为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某种契机，那么经过20年左右战斗洗礼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成熟性，则有能力使发展统一战线思想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风风雨雨的考验，是早已走出狭隘圈子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导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大党。她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①毛泽东经历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而且在到达延安以后，经过研究和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158页。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也有了透彻的了解。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卓识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驾驭中国革命的能力，得到了全党普遍的认同。他已经是全党无可争辩的领袖。他对于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早有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能审时度势，提出对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从而领导全党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粉碎国民党以制造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他进一步总结与国民党斗争的经验，发展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提出的原则、政策和策略，使其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完善化了。

二、发展之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并进一步加以区别

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讲，实质上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是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从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无不与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1925年1月的党的四大虽然开始看到有“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两个部分，但却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虽然已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其认识并不牢固，彻

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抗日战争时间，而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则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形成的。

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常会上谈及这个问题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才正确的认识清楚。这是讲的这篇著作的1940年的修改稿。在1939年12月写作该书初稿时，诚如他在1940年致肖向荣的信中所说：当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看出来了”。^①因此，《共产党人》杂志1940年第4、5期发表的该书初稿上只是一般地将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而将大资产阶级纳入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之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即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②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还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看法），因而没有将大资产阶级列入买办阶级，而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因为是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初稿中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时，对其“反动性”作了份量比较重的评论。

经过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无论从提法到内容分析都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162页。

② 《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第8页。

来了。这个变化首先反映在1940年3月11日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之中。这是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以下简称“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是对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经验的深刻总结,全面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堪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献里,毛泽东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①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把打击对象孤立到最低限度。这是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所做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采取的正确方针。

根据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修改。这就是他在致肖向荣信中说:“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②从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该文可以看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

② 《毛泽东信选集》第161页。

其修改是不小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将大资产阶级明确地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区分出来，并将其纳入于买办阶级。这样，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就是“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个修改稿还加上了对于“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的一整段文字，删改了将大资产阶级放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而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的不妥当分析的有关文字。建国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建国前的修改稿，只是在文字上又作了些改动，使表述更加准确。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并对大资产阶级作进一步分析的新认识，还反映在《〈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修改上。《〈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写作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两个多月。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号刊载的原发表稿总结统一战线的规律时讲了5条，对资产阶级没有作明确区分。建国初的《毛泽东选集》收入该文时对此作了修改，除了其他的文字性修改外，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增加了对大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的第3条，将5条规律改为6条规律。新增加的第3条就是根据1940年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形成的认识写的。这一修改也说明，这个认识的变化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对资产阶级理论认识的飞跃。

为了进一步从社会实际中弄清资产阶级的问題，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还向在国统区工作的南方局、东南局发出指示，要求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

联系，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他还提出，对这个问题分省调查时，要为被调查的每人立一小传，包括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与此相联系，调查对象还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各总司令、军长、师长三级军官在内）。毛泽东的阶级调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想先从经济、军事两方面着手，将来扩大到政治、文化方面，最后汇总为名人录，供召开党的七大研究用。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报告，对资产阶级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以前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是可变派，是较好的同盟者。现在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军界、政界是张学良、杨虎城、于右任、冯玉祥、卫立煌等，在经济界是陈嘉庚等。对这些人，我们要研究，要代为立传。在毛泽东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分左中右三派，而以两面派为多，希望祖国复兴者为多，极少数是亲日派，另外的少数很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对于其中的右派也需要某种必要的批评。对于大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在抗战问题上也分为三派：（1）右派，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是半身不遂；（3）顽固派中的左派，也是可变派。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在军事斗争停止以后主要是批评，也要孤立他们。这与孤立投降派不同，还要团结他们。毛泽东从顽固派中分出可变派，对可变派采取分化和拉拢的办法，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批评。这是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

的又一个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这以后，毛泽东继续注意研究资产阶级问题。即使是在何、白“皓电”、蒋的“齐电”之后，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仍强调要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别。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且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既联合又斗争的一切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①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的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并说，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这样，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并相应地产生了对两个部分的正确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尽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交织一起，阶级斗争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甚至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党却牢牢地把握住了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4页。

争的大方向，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乱其方寸，是与毛泽东在抗日斗争形势下对阶级关系的正确估量，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分析及其采取的正确政策分不开的。

三、发展之二：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和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

对待中间势力的不同认识，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中间势力，是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持的中间政治立场而言。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它包括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在土地革命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但整个中间势力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却提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在1932年1月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要求把中间派别作为“主要的力量来打击”。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他们拒绝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和其他反蒋势力组成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战线，坐观其反蒋失败，从而使中央苏区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始终反对王明中央拒绝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左”倾政策。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上述“左”倾政策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只博得敌人的喝采。”^①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事实上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特别是“中间势力”跑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1937年11月12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所谓“左翼集团”，即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与巩固这个集团。“右翼集团”则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②这是毛泽东明确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

在1939年1月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后，其顽固派不断在河北、山东，特别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摩擦及武装冲突。毛泽东更加强调对中间分子要加紧工作，提出每个革命同志都去办“小统一战线”，使其愈多愈好，“许许多多的小统一战线，作为基本，组成大统一战线。”^③

在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各根据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5页。争取中间力量的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了萌芽。

② 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419页。

③ 1939年9月18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九一八”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斗争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

首先，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视为与发展进步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个思想的初始表述是：极力孤立一切向我进攻的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中，不仅明确地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而且对这三种势力的基本倾向作了较深层次的剖析，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他指出：中间势力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些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保持勉强的中立，有些则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同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对顽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无从发展。因此，他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即（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第3条很重要。因为顽固派也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党陷于孤立，并且指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

“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①在蒋介石指使韩德勤酝酿苏北战争期间，1940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逐步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个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今后还要加强这项工作。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反复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观念在全党逐步地树立起来，并成为我们党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

其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斗争的一个焦点。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建立，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要求建立。这个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无论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参加。毛泽东很重视民主政权建设。在人员分配上，他在1940年3月6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党规定这样的比例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是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